

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演变及其趋势

王正毅*

【内容摘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现实变革和研究议题的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本文对各个阶段研究方法的特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首先对20世纪70-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期间其主要研究方法的知识谱系来源及其特征进行了总结;然后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为构建“科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使用的还原主义方法的特征及其局限性进行了分析;最后,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分析折中主义方法的趋势进行了概括。由此得出结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历史发展经验表明,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不能将其简单化、教条化和绝对化,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但取决于研究方法的选择,更取决于所关注的现实变革和研究议题的设定。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 历史社会科学 还原主义 折中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学术界,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于20世纪90年代逐渐进入中国学术界并得到了飞速发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深化历程中,作为一种理论探索,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大理论”创新和“中层理论”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和研究路径,深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和发展。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因其所面临的研究问题不同,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90年代,其重点是回归历史社会科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寻求国际关系的政治和经济关联性;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其重点是通过还原主义方法努力构建“科学的”开放政治经济学;第三阶段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其重点是以折中主义的分析方法寻求物质力量和价值观念的关联性。

一、重返古典政治经济学寻求范式

20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第一次大的理论论战。论战的双方是崛起的古典

* 王正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东亚地区合作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与中国的发展,zywang2005@pku.edu.cn。

本文是在作者所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与方法》(《欧洲》2001年第1期)、《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实现变革、议题设定与理论创新”(《国际观察》2021年第1期)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七章的部分内容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论战的最终结果是古典现实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的研究，其里程碑式的著作是摩根索于 1948 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在国际事务中，国家安全居于第一位，军事安全或战略问题属于“高级政治”，而经济和社会事务属于“低级政治”。国家、权力以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冷战”为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证据。在这种状况下，安全问题成为国际关系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首要问题。

然而，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期，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受到国际关系现实变革中一系列事件的挑战。这些事件主要包括：1951 年开始的欧洲煤钢联营以及随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1968 年开始的美国与日本持续 20 年的贸易摩擦；1971 年的“尼克松冲击”以及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1973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集体行动导致的石油危机。这些事件使得美国霸权主导的战后世界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国际体系受到了挑战。国际关系研究者在关注国家安全的同时，开始关注经济要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因此而兴起。

如何寻求国际关系中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是 20 世纪 70 – 80 年代国际关系研究者在方法论上关注的主题。如果依据研究路径来看这些争论，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类。

一类是“历史社会科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依据这种路径比较成型的流派，当推以劳尔·普雷维什和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和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当然也包括以罗伯特·考克斯为代表的“批判学派”。这种路径暗含的逻辑是，政治和经济本来是一个领域，同时存在于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和结构之中。这种方法主要从社会经济历史的角度探讨已经形成的历史的结构和过程，并且假定在这种历史过程中，政治和经济是“一个领域”，不是“两种不同的逻辑”。

另一类是政治经济学。具体地说就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这种研究路径暗含的逻辑是，政治（政治学）和经济（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因此，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主要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这种方法是作为主流方法出现的，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理性主义”分析，具体包括两种路径：一是依据政治学的方法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其中最为学界认可的是著名的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和联盟经济；二是依据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领域的问题，并以此形成相互依存论和国际机制论。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政治和经济的关联矩阵”（参见表 1）。

表 1 国际关系中政治和经济的关联矩阵		
政治学 经济学	作为一种探究方法的政治学	作为一个探究领域的政治学
作为一种探究方法的经济学	传统的政治分析（用政治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领域的问题）。	公共选择或新经济政治学（用经济学的概念、假设和方法探究政治问题），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典型的是相互依存论和国际机制理论。

续表

政治学 经济学	作为一种探究方法的政治学	作为一个探究领域的政治学
作为一个探究领域的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用政治学的方法和概念来探究经济活动），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典型的是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和联盟经济。	传统的经济分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

资料来源：王正毅（2022）：《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页。

正是在这些研究方法的应用中，国际体系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问题得到了回答，催生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大理论”的构建。其中影响至今的“大理论”包括：关注国际经济中国家之间政治合作的“相互依存论”；关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以及权力分配的“霸权稳定论”；关注国际体系中不平等发展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及关注国际组织作用的“国际机制理论”。

二、还原主义的盛行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面临两个现实的挑战：一个是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另一个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拓展。对于冷战的结束，学者们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未能给出满意的解释而感到不满，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过分注重物质利益提出质疑，进而引发了国际关系“第四次论战”。而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则促使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国内政治，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将比较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OEP），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辩论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面对建构主义的挑战和批评，理性主义也开始了新的自我完善，修正理论前提和分析框架，而理性主义的这种进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为明显，特别是美国学术界，更是在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旗帜下，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努力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化”。虽然这种强调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受到英国学派和批判理论的质疑，但却主导着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开放经济政治学”主要是由美国学术界“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们，如哈佛大学的杰弗里·弗里登、普林斯顿大学的海伦·米尔纳和加州大学的大卫·莱克倡导的。他们继承了20世纪70年代注重国内利益的研究路径，但认为只研究国内利益是不够的，因为利益通常是通过那些对政策产生影响的政治制度反映出来的。所以，他们主张不但要对国内利益进行研究，而且还要对国内制度进行研究。这样通过对国内利益和国内制度的比较研究，就可以将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将其科学化。按照莱克教授的总结，“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可以简要地概括为



如下三个步骤。^①

第一步是确定利益及其行为体。利益被认为是开放经济政治学最为基本的核心概念，这里的利益，既可以是个人利益，也可以是群体的利益。由于群体的利益通常是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体利益的汇总，所以，开放经济政治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利益。群体通常是指厂商、行业或生产要素的拥有者。

开放经济政治学通常是通过经济理论（比如特定要素模型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来确定哪些行为体（厂商、产业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拥有共同的可以认定的利益，然后研究这些行为体的利益如何影响相关国家政策偏好的选择，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中采取不同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分配效应。

第二步是研究国内制度。与 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主义不同的是，开放经济政治学认为，只关注利益是不够的，因为利益并不能直接导致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产生，而是通过国内政治制度来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所以，开放经济政治学主张，既要研究政治制度如何将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汇集起来，也要研究政治制度如何为相互对立的利益群体进行谈判提供条件。

第三步是国际谈判。当国内利益通过国内政治制度汇集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后，由于任何政策都有外部性，所以，一个国家的政策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为了保证一国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就需要与其相关的国家进行国际谈判。对于国际谈判，开放经济政治学主要关注两类问题，一类问题是，在国际谈判中，国际制度如何影响讨价还价的过程以及结果，以及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满足成员国的目标。另一类问题是研究合作收益的讨价还价过程，即合作分配问题。

这样，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是由三个子系统构成的，即私人企业利益的形成，汇集各方利益并将其转化为政府偏好的国内制度，以及进行国际谈判，这三个子系统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可以通过统计分析分别对三个子体系进行独立验证并进而获得一般性知识，这种一般性知识可以超越以往比较政治经济学假设的国内政治的差异性。开放经济政治学这种分析方法被学术界称为还原主义的方法。^②

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代学者们高举理性主义大旗，在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口号下，试图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并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使之科学化。由于在还原主义研究方法方面得到空前的强化，“开放经济政治学”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性学派，直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将理性主义推向极致的还原主义方法才开始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

三、分析折中主义的兴起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冲击，而且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性主义提出了挑战。就像 20 世纪 70 年代新现实主义的“体系层次理论”没有预见到冷战结束而备受质疑一样，“开放经济政治学”

^① Lake, D. A. (2009). Open economy politics: A critical revi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4 (3), 219–244.

^② Oatley, T. (2011). The reductionist gamble: Open economy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5 (2), 311–41.

也因为没有预见到全球性金融危机而饱受诟病。正是在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所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变革的反思中,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论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分析折中主义的兴起。^①折中主义作为一种方法或一种研究路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结构和行为体的互动;二是物质力量和价值观念的互融;三是规范和实证的折中。分析折中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不仅体现在美国主流学派的内部争论上,也体现在批判学派和美国主流学派的对峙中,同时还体现在英国学派和美国主流学派的对话中。

(一) 结构和行为体的互动

这主要涉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分析单位以及单位层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宏观结构和微观行为之间的关系。在“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中,为了回应国际体系出现的变革,构建宏观大理论,无论是继承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术传统,还是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以体系为中心(system-centric approach)来研究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是非常普遍的。不管他们在具体主张上是如何不同,但在强调“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的结构重要性上是完全一致的。然而,这种强调宏观结构的研究路径在随后的经济全球化以及美国学派构建所谓的“科学化”的“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浪潮中荡然无存,直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大冲击就是体系层次或结构变革问题的回归,这尤其体现在美国学派或国际组织学派内部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批评、反思和修正上。批评者们普遍认为,“开放经济政治学”有两个局限性:一是“开放经济政治学”过分强调单个国家政府决策的独立性,忽略了外部行为体的作用。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独立于其所处的国际体系,在国家的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中,国际体系、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国家对政府政策的形成过程都会产生影响,而“开放经济政治学”只强调国内政治制度的作用,而忽略了这种宏观过程对国内政治制度的影响。二是“开放经济政治学”过分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忽略了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对不同国家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形成以及相关政策的影响。“开放经济政治学”假设,世界政治经济结构是稳定的,但现实的世界经济通常是不稳定的,诸如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通讯技术的变革、边缘区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跨国公司对全球性规则的参与等,这些都可能引起世界经济结构性变革。鉴于此,强调结构和行为体互动的折中主义分析方法开始在美国学派的研究中兴起。

正是在这种折中主义方法的启发下,新一代学者对早期的相互依存论和霸权稳定论进行了修正,出现了新相互依存论^②和霸权秩序论^③。如果我们将新相互依存论与早期相互依存论做一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折中主义方法的具体体现。^④

第一,早期相互依存论假设,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国家是最为基本的行为体,国内

① 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2012):《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21页。

② Farrell, H., Newman, A. (2016). The new interdependence approach: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 demonst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5), 713-736.

③ Ikenberry, G. J., Nexon, D. H. (2019). Hegemony studies 3.0: The dynamics of hegemonic orders. *Security Studies*, 28 (3), 395-421.

④ 王正毅(2022):《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8-69页。



所有行为体（个人、企业、利益团体）都存在于国内/国际二分法之中。而新相互依存论者认为，全球化并不是在无政府状态之中进行的，而是在一种规则重叠（rule overlap）的状态下进行的。在新相互依存论者看来，随着国家之间相互渗透，市场规则与全球性机制之间的冲突就不断增加，这就迫使那些不断国际化的私人行为体不得不面对这些相互冲突的规则，他们为了寻求全球市场的稳定性，可能在政治上偏离支持他们母国的市场规则。随着市场规则重叠程度的提高，全球化降低了现存的政治妥协性。

第二，早期相互依存论假设，个人、企业、利益团体这些行为体，主要是通过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渠道来表达各自的偏好，并在国内通过相互之间的博弈进而影响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而新相互依存论者则认为，全球化为集体行动者进行各种跨国联盟创造了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这种跨国政治联盟不但会加深国内社会的裂痕，而且会产生跨国性分裂以及形成跨国性的新联盟。

第三，早期的相互依存论假设，经济全球化完全是一个外在变量，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主要是国家之间通过相互谈判而制定的。而新相互依存论则认为，制度不只是游戏规则，也是权力不对称（asymmetric power）的一种主要来源。制度不仅可以汇集国内行为体的各种偏好，而且制度会使得有些行为体较其他行为体更具有优势，更易于接近资源，这就很容易导致国内各行为体拥有的权力不对称。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霸权秩序论或霸权稳定新论之中，与20世纪70年代的霸权稳定论相比较，折中主义在霸权秩序论或霸权稳定新论中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①

第一，霸权塑造的国际秩序远比霸权本身重要。早期的霸权稳定论主张，国际体系需要一个稳定者，否则国际体系就会出现军事冲突或经济混乱，这个稳定者就是霸权国家。与早期霸权稳定论强调霸权国本身不同的是，霸权秩序论更为强调霸权国塑造的国际秩序。在他们看来，霸权国或领导者的重要性不在于其作为国际体系的稳定者，而在于其所塑造的国际秩序，即霸权秩序（hegemonic order），霸权国塑造的国际秩序远比霸权本身重要。

第二，霸权不仅是国际秩序的塑造者，同时也是国际秩序的接受者。早期的霸权稳定论强调的重点是霸权国的意愿和能力。霸权秩序论的倡导者们则更强调霸权国塑造国际秩序的过程。在他们看来，在霸权国塑造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就参与的行为体而言，既有霸权国家或领导国家，也有作为追随者的次要国家；既有国家行为体，也有非国家行为体。

第三，国际社会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处于一种具有自由特征的等级秩序之中。国际社会并不像早期霸权稳定论所假设的那样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处于一种由领导者和追随者形成的具有等级性的权力结构之中。在这种具有等级性的国际社会中，制度允许领导者和追随者相互讨价还价，所以，这种秩序是具有自由特征的等级秩序或自由的霸权秩序。早期的霸权稳定论因无法解释霸权衰退后国际秩序如何维持而受到挑战。

（二）物质利益和价值观念的融合

这主要体现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选择。正如前面所言，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为了寻求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和经济关联性的理论范式，学者们重返古典政治经济学，出现了基于不同学术传统的分析路径，并因此产生了基于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

^① 王正毅（2022）：《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92-94页。

的霸权稳定论和国家主义，基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相互依存论和国际机制论，以及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这些“大理论”的构建虽然实现了学者们寻求国家关系中政治和经济关联性的目标，但也引起了这些理论构建者们相互之间的争论甚至论战，这就是20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学界为人熟知的“范式之争”。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尽管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但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稳定的背景下，研究者们将研究转向国内政治。他们围绕着“利益和制度”的关联性以及“国内和国际”的关联性，通过强化理性主义的分析工具，强调物质力量，进一步深化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美国学术界甚至提出了“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努力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化”。

然而，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暴发，围绕着美国霸权衰退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的变革，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新一轮的理论论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因忽略体系层面的变革而受到批评和质疑，关注体系变革和危机等大问题的英国学派和批判学派再次回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中。“开放经济政治学”假设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结构是中性的，因而主张寻求因果关系并从经验上进行证实或证伪。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假设不同，无论是批判理论还是英国学派都强调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理论总是某些人的理论，因而是有目的的，任何脱离价值判断的经验性研究都是有局限性的。对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这种理论范式折中的转向及其趋势，连积极倡导和推动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弗里登和莱克也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这四种视角进行划分在许多方面是有用的，在对经济效用、阶级冲突、地缘战略以及规范的重要性进行评估时尤其如此。”然而，这些视角之间的界限通常是模糊的。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同意现实主义对国家之间冲突的强调，而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同意自由主义对经济利益的重视，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同意建构主义对规范作用的认识。同样，有许多自由主义者喜欢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就像现实主义者所做的一样去分析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或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去探讨阶级冲突。而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对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规范的作用有着愈来愈深的理解。在我们看来，这些不同视角的实质性重叠表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与其固执地坚守某一种特定的范式，不如认真地思考一下利益、互动和制度，是如何激励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中观察到的那些行为体，影响它们的选择，以及决定最后的结果。”^①

（三）实证和规范的融合

这主要关乎国际关系研究具体操作路径的选择。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无论是追寻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还是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抑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规范分析方法。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追寻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学者从比较优势出发，认为“自由贸易”不但有利于贸易双方，而且也有利于世界财富的整体增长；而倡导重商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学者则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一国所得必然意味着另一国所失，因而主张“贸易保护主义”。

^① Frieden, J. A., Lake, D. A., & Broz, J. L. eds. (2017).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Sixth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pp. 12-13.



由此, 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争论的主要范式。在生产领域, 在自由主义的分析框架下, 无论是维农 (Raymond Vernon) 的“产品周期理论”, 还是邓宁 (John H. Dunning) 的“折中理论”或“OLI 模式”都在强调东道国以及跨国公司的优势, 所不同的只是前者主要强调国家之间财富和技术的差异, 而后者则主要强调所有权、区位和国际化的优势; 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下, “等级”和“不等价交换”成为最基本的范式。在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存在着核心区和边缘区, 处于核心区的国家和处于边缘区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而在国家主义 (现实主义) 的分析框架下, “国家功能”是一个最为基本的范式。他们认为, 经济增长和扩散不仅存在于核心区, 而且也出现在边缘区,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国际体系的核心主要依据其是否发挥有效功能。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转向了实证分析。“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通过借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 从“问题领域”入手,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出现了从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范式之争”向“问题之辩”的重大转向。例如, 在国际贸易领域, 学者们不再停留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规范争论上, 而是比较研究不同的国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内政治根源; 在生产领域, 学者们不再停留于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这种“二分法”上, 而是集中研究母国国内政治 (利益集团)/跨国公司/东道国国内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关联性; 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 学者们也不再停留在讨论美元霸权这样单一的问题上, 而是研究汇率政策产生的国内政治根源, 最优货币区的设计以及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

然而, 随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体系层面“宏观大问题”的回归以及国际和国内行为体的互动, 强调实证分析的“开放经济政治学”受到质疑。重新评估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的作用, 强调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并举, 这种趋势既体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坚持批判理论的新一代学者的研究中, 也体现在新一代“英国学派”的研究中。

与“开放经济政治学”强调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不同, 批判理论反对基于个人主义的理性行为体模型, 倡导对单个行为体进行具体的社会建构, 批判理论尤其强调历史的分析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无论是法兰克福式的批判分析, 还是葛兰西式的批判分析, 抑或是福科式的批判分析, 强调历史分析和结构分析是批判理论的共同特征。在批判理论看来, 国家和市场、制度与权力,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是相互分离的, 而是相互建构的, 这种建构既是历史的, 也是社会的。

英国学派则更强调通过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 对系统性的变迁进行研究。“美国学派”假设“个人”和“国家”都是理性的, 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中, 他们/它们作为行为体, 都是遵循理性原则而进行利益最大化选择, 所以最终的政策结果都是通过相互的博弈达到利益的局部均衡 (国内的和国际的)。与之不同, “英国学派”则假设, 任何行为体都受到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制约, 其行为选择并不总是对外在环境的理性的回应, 行为选择反映了行为体的社会愿望, 而这种愿望则是社会对经济规范认同的结果。所以, “英国学派”关注的是分配结构 (国内的和国际的) 是如何影响行为体的经济利益与经济认同 (国内的和国际的)。简而言之, “历史社会科学”和价值批判是“英国学派”的方法论基础。

四、结论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 无论是 20 世纪 70—80 年代为寻求政治和

经济关联性而盛行的规范研究，还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追求学科“科学化”而得以强化的实证研究，抑或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分析折中主义，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对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历史发展经验表明，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不能将其简单化、教条化和绝对化，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但取决于研究方法的选择，更取决于所关注的现实变革和有效的议题设定。

（责任编辑：马涛）